

李之藻信奉天主教的緣由探考

陳明生

〔編者按：本文原刊於馬泰來等著，《中國圖書文史論集》（錢存訓先生八十榮慶紀念），台北：正中書局，1991，頁313-319。承蒙作者慨允轉載，特此致謝。〕

導言

李之藻(1565-1630)字振之，號我存，是明末清初中國天主教「開教三大柱石」之一。另外的兩大柱石是衆所週知的徐光啓(1562-1633)和比較陌生的楊廷筠(1557-1627)。(註一)這篇短文雖然集中對李之藻信奉天主教的緣由加以探討敘述，但也關聯到徐光啓和楊廷筠兩人的信教經歷。

據天主教史學家方豪調查所得，就原始史料來說，有關徐光啓的資料最爲豐富，包括明史正傳、家譜行實、宗祠著錄、個別文集、方志載記、手跡、遺像、早期西文傳記、早期中文傳記等多種，且尚有遺墓和源遠流長的後裔可以查攷。有關楊廷筠的原始史料就只有方志載記、早期中文傳記，以及個人著作等三類，有關李之藻的原始史料也只有方志載記、早期西文傳記、個別文集及書牘選錄，和所寫的序跋多篇等四種。(註二)從原始史料多寡的份量來看，就可以明白何以近數十年來所出版的有關早期中西文化交流 and 天主教傳入中國史的論著，常常提到徐光啓的功績。

大體說來，研究徐光啓生平的學人不但可以參攷本世紀初所刊印的《徐文定公全集》和有關資料，更可參讀近年來王重民編輯的《徐光啓集》、梁家勉編著的《徐光啓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的《徐光啓著譯集》。（註三）研究楊廷筠生平的學人就比較難以着手了，幸好近年出版的比利時籍神父鐘鳴旦所著《楊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可補了這方面的不足，並且指出繼續研究的方向。（註四）研究李之藻生平事蹟的人，只有阮元《疇人傳》中的「李之藻傳」、陳垣的《明浙西李之藻傳》和方豪所著《李之藻研究》可作主要參攷。（註五）尚幸台灣學生書局在紀念李之藻誕生四百週年時影印出版李之藻在一六二九年所彙刻的《天學初函》，（註六）自從一九六五年起，研究李之藻生平事蹟的學人才掌握了這一種必不可缺的史料。

雖然研究李之藻生平事蹟的史料增多了，但考據其家世淵源和後裔的資料依然缺乏。因此一般傳記都對這個題目略而不談。方豪幸能搜集到萬曆皇

帝賜予李之藻及其父的誥命，但裡面並沒有提到李氏父親的名字，僅說他以「經史自娛，聖賢爲則」。方豪又查出了欽天監監生李次彬是李之藻的兒子，但對於其他後代就沒有資料了。（註七）《明萬曆二十六年進士題名碑錄（戊戌科）》列出李之藻以第二甲第五名成進士。由此可知李之藻的父親和祖先是軍人出身。葡籍耶穌會士曾德昭神父（1585-1640）自一六二二年起在杭州和李之藻相處了數年，他在一六四一年所出版的《中華帝國誌》裡也提到李之藻是軍人的後裔，並說到楊廷筠是李之藻的親戚，在南京有兩位天主教徒也是李之藻的親戚，（註九）看來曾德昭所述是有事實根據的。在研討李之藻奉教緣由的時候，由於直接材料不多，我們不能不借重耶穌會傳教神父們的早期記載，並且參照研治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學者們最近的研究成果。

利、金、艾三氏筆下的李之藻

一般地說，耶穌會士早期的記載都認爲李之藻

信奉天主教的緣由有三：（一）西方科學，包括地理學、數學、天文學等的吸引；（二）天主教教義真理的啓示，和（三）利瑪竇人格的感化以及友誼因素所產生的影響。他們通常忽略了晚明學術風氣，儒士內聖外王和經世致用的懷抱所產生的影響。他們也不顧及徐光啓、李之藻、楊廷筠等人是以「吾儒」的立場來信奉天主教的。陳垣和方豪也大致接受耶穌會士們的看法。

利瑪竇(1522-1610)在逝世前曾完成一本義大利文的《中國札記》，同會會士金尼閣(1577-1628)把它帶回歐洲，加以修正和增訂，並譯成拉丁文於一六二五年刊印。（註十）利瑪竇、金尼閣的《中國札記》告訴讀者，李之藻在一六零一年是工部的高官，受到利瑪竇所繪製的《萬國輿圖》的吸引，遂向利氏學習地理學，並且協助利氏重新編印新版《萬國輿圖》。以後又在利氏的導引下學習數學和天文學，並且翻譯了幾本數學和天文學的書籍。利氏是用西方科學作為「漁人之網」來導引李之藻認識

天主教教義的。（註十一）李之藻雖受感動，但因不能接受一夫一妻的誠條，一時不能接受洗禮，可是他立即勸告他的家人和親戚入教，包括兩位曾中科舉的親戚。（註十二）《中國札記》也提到李之藻曾任福建省舉人省試的考官和派到山東任職。此後因為在定期考績時被控溺職，受了三年的貶職處罰。溺職在於李之藻酷愛宴會和麻將牌奢。但在受完罰後又被調回到北京做官。一六一零年初，李之藻成爲在利瑪竇手中最後領洗的一位中國天主教徒。（註十三）這段記載並沒有暗示李之藻受處罰是受政治鬥爭的影響，反而稱讚中國文官制度良好。也許李之藻才智過人，只是行爲上在短時期內沒有缺點，中文資料對此事倒是一字不提。

關於李之藻受洗的經過，艾儒略神父(1582-1649)在他所著的《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一書裡有這樣一段動人的記載：

太僕我存李公久習利子，服其器識，凡有所行，多與相商。覺從利子之言則順，間有不從者，

後必有悔也。厥後李公忽患病京師，卽無家眷。利子朝夕於床第間躬為調護。時病甚篤，已立遺書，請利子主之，利子力勸其立志奉教於生死之際，公幡然受洗，且奉百金為聖堂用，賴天主寵佑，而李公之疾已痊矣。（註十四）又記著利瑪竇去世後的情況說：

太僕李公經其喪事，市堅木為棺，會士阻之不得，匠人欲速其功，懼天災而體變，李公曰：勿亟也，子第加功焉。吾知利子雖百日不壞矣。越兩日始就木，前後縉紳來弔者，無不極口稱讚。（註十五）

李之藻信任利瑪竇的「器識」，「凡有所行，多與相商」，可見交情的深厚，所以在利瑪竇「力勸」之下，在病重垂危的時候受洗奉教了。這也可以看到天主教教義對生死關頭有解脫醒悟的影響。至於利瑪竇人格的感化也是不言而喻的。不然，李之藻不會說：「吾知利子雖百日不壞矣。」

此外，儒家學說本身的理論，也可能是促使以

儒學為基本、在科第上有成就和官運不錯的李之藻毅然信奉天主教的原因。D. Lancashire 教授說：「儒家學說經過許多世紀的演變，已經完全把它的宗教成分理性化了，儘管它也有它的形上學，它只能在政治和倫理的範圍內起作用。」（註十六）儒士們或信佛教，或信天主教是有它的基本根源的。

曾德昭筆下的李之藻

曾德昭所著《中華帝國誌》最後一章前半部標題是「李之藻博士（進士）的一生和逝世」。（註十七）這是李之藻的簡要傳記，對他信奉天主教和支持傳教士的熱誠記載甚詳。雖然文中也重覆《中國札記》和《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部份內容，但有多處是前兩本書所沒有寫過的。

據曾德昭說，耶穌會士們每年寄回到歐洲總會的《年訊》中均報告過李之藻對建立中國教會的功勞。藉著他的榜樣，一些品格高尚的中國士人都信奉了天主教，包括楊廷筠在內。至於李氏本人奉教

的原因，要追溯到當年他在爲利瑪竇所著的《天主實義》潤色的時候。當時他發現該書充滿縝密的真理，天主教義的神秘性和規律性尤使他驚嘆不已。（註十八）曾德昭斷言李之藻終生非常憎恨迷信，認爲崇拜佛教菩薩偶像的人不是受了欺騙就是盲目無知。他同時也認爲凡是聽過天主教教義或讀過講解天主教教義書籍的人，都會自然而然地信奉天主教的，不然那個人就是沒有頭腦或者無法教導了。曾德昭並且引證李之藻的見解，說他堅信凡是讀過介紹西方科學的書籍的人也都曾體認到天主教的真理和接受天主教的聖誡教律，這是李之藻爲甚麼經常鼓勵耶穌會神父們多多翻譯西方科學和宗教書籍的緣故。李之藻和楊廷筠在耶穌會士受到迫害的年代竭力保護他們，也是出於這個原因。李之藻寫信給葡萄牙耶穌會分會會長馬斯卡任那神父，催促他多派會士們到中國來也是爲此，因爲中國語言文字不容易學習。（註十九）後來李之藻奏呈中國皇帝，請召回被驅逐到澳門的耶穌會士，不但是要讓他們

徵募澳門人來協助中國朝廷抵抗滿州人的入侵，而且也是要使神父們回來繼續他們的翻譯工作。

曾德昭表示就他所知，耶穌會士們自入中國後到他本人執筆著書的時候爲止，一共翻譯了五十多部西文書籍成爲中文，一般說來，只有極少的幾部沒有經過李之藻的手。他或者協助翻譯、或是潤色、或是寫序言後跋、或是重刊、或是彙刻。從這一段記述來看，李之藻對介紹西學和天主教的功勞的確是比明末清初的任何一位中國天主教徒更大。方豪也認爲李之藻在一六二九年彙刻的《天學初函》的功勞是永久值得讚頌的。（註二十）

曾德昭沒有特別標出李之藻忠君愛國的情懷。但就我們所知，李之藻一如徐光啓，愛國不甘後人。徐李二氏都是中國現代化的先驅，雖然他們所提倡的西方科學及天主教，和五四運動以來愛國人士所提倡的科學與民主略有不同，但是他們兩人加上楊廷筠，都可稱爲中國現代化的先知先覺。（註廿一）曾德昭又提到李之藻手不釋卷，儘管晚年一目失明，

一目極端近視，讀書的時候要把眼睛靠近書本。這種學而不倦的精神也是值得後人欽佩的。

近年西方對三柱石奉教緣由的研究

由於對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興趣的增加，近年來有些西方學者對中國天主教「開教三大柱石」奉教的緣由作了不少研究，各有所見，簡介如下。

鐘鳴旦神父在其《楊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一書內，清楚地指出楊廷筠是受了明朝末年的「綜合」學術風氣的影響，他說楊廷筠「初時是一名合儒佛兩家的信徒；後來則變成一位合儒家與基督宗教思想的人。」楊廷筠的信奉天主教可說是利瑪竇用天主教適應儒家學說傳教政策的成功。（註廿二）後來一部份耶穌會士背離這種政策，就很少再有具名望的中國士大夫信奉天主教了。法國漢學家 J. Cernet 說，在一六二〇年以後，中國士大夫對天主教不再感興趣是因為天主教學說與儒家學說根本不相容。這種論點已受到鐘鳴旦的辯駁。顯然，這是

一個值得深加研究的題目。Paul A. Rule 對此也有異議。（註廿三）

德國學者 M. Uebelhor 認為徐光啓奉教的原因是修己治人的儒家一貫之道，信奉天主教幫助了徐光啓的己立立人的忠君報國的行動。（註廿四）這種說法是很有道理的。徐光啓在一六一六年所寫的《辯學章疏》裡就很明白地說：「必欲使人盡為善，則諸陪臣所傳事天之學，真可補益王化，左右儒術，救正儒法者也。」（註廿五）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 W. J. Peterson 在一篇論文指出，楊、李、徐二人奉教是因為他們都發現「天主教供給了一個外在的和普遍的道德原則。」（註廿六）很顯然的，這是專從理性方面推究出來的結論；但從複雜的人生問題上著眼，這種看法也有一定的價值。

澳大利亞墨爾本 La Trobe 大學教授 Paul A. Rule 在他的近著《孔子》一書，認為三人奉教的主因是他們都接受了利瑪竇對儒家學說的解釋，都相

信天主教能使儒學傳統回到它的原始根源，從而挽救明朝末期世道日衰的狀況。（註廿七）這種論點可說是很中肯的。

結論

從筆者看來，單從一個方向解釋或只選擇一種因素來解釋複雜的人生、變遷的社會和歷史文化的發展，都會顧此失彼，不夠完善。（註廿八）關於李之藻奉教緣由的探考，我們也必須從多方面搜索，也許最適宜的解釋應該包括下面幾點：利瑪竇帶到中國的西方科學技術知識，引起李之藻的好奇好知心理；利瑪竇的高尚人格和誠摯的友誼激發了李之藻對天主教的興趣；明朝末期的「綜合」學風和天主教適應儒學的方針，促進了李之藻用天主教「補儒」和返回儒學本原的心願；滿洲入侵的危機促使李之藻全心對引進西方技術的努力。上述幾種原因和李之藻個人的選擇，大致構成了李之藻奉教的緣由，使他毅然不顧批評和個人安危來保護那些被迫

害的耶穌會傳教士。李之藻的信教和西洋耶穌會士對李之藻的讚揚都是合情合理的，同時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頁值得記載的史詩。

＊本文撰寫時多承芝加哥大學戴文伯先生惠予指導並賜寄影印史料，又蒙哈佛大學吳文津先生及台灣大學古偉瀛先生分別賜贈罕見資料，特此一併敬致謝意。

註釋

- 一·方豪《天主教史人物傳》（香港：公教真理學會，1967-73）第一冊，頁99,112,135。
- 二·方豪《李之藻研究》（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頁5-7。
- 三·王重民《徐光啓集》2冊，（北京：中華書局，1963）；梁家勉，《徐光啓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徐光啓著譯集》，2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四·N. Standaert, Yang Tingyuen: Confucian and

- Christian in Late Ming China (Leiden: E. J. Brill, 1988)。中譯本：鐘鳴旦《楊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聖神研究中心譯（香港：聖神研究中心，1987）。
- 五・阮元《疇人傳》，卷32，明4；陳垣《明浙西李之藻傳》（《辯學遺牘》本）；《李我存集》（《明經世文編》卷483-84）；李日華《四六類編》；李之藻簡牘選輯，篇目見方豪《李之藻研究》，頁52。
- 六・李之藻彙刻《天學初函》，6冊（台北：學生書局，1965）。
- 七・《李之藻研究》，頁6。
- 八・《明清歷科進士題名碑錄》（台北：華文書局，1969），頁1073。
- 九・Alvarez de Semedo,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 (London, 1655), p.212。以下簡稱 Semedo, *History of China*。
- 十・Matteo Ricci,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s of Mathew Ricci, 1583-1610*, tr. by Louis J. Gallagher, S.J.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3), pp. xi-xv, xvii-xviii. 中譯本：《利瑪竇中國札記》，2冊，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何兆武校（北京：中華書局，1983）。
- 十一・Ricci, *China*, p.398.
- 十二・同上引，頁537-538。
- 十三・同上引，頁454-55, 564, 567。
- 十四・向達《合校本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北平：上智編譯館，1947），頁19。
- 十五・同上引，頁20。
- 十六・Douglas Lancashire, "Anti-Christian Polemics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Church History*, Vol. 38, No. 2 (June, 1969), p.241.
- 十七・Semedo, *History of China*, p. 239. Part II, Chapter 13 heading: "The Life and Death of Doctor Leo : and the Conclusion of this

History."

- 十八・同上引，頁240。
- 十九・同上引，頁242-243。神父的全名是 Mungnez Mascaregnas。
- 二十・同上引，頁244-245。方豪《李之藻研究》，頁131。
- 廿一・參看 Min-sun Chen, "Hsue Kuang-chi (1562-1633) and His Image of the West," in *Asia and the West: Encounters and Exchanges from the Age of Explorations (Essays in Honor of Donald F. Lach)*, ed by Cynriac K. Pulpally and Edwin J. Van Kley, (Notre Dame, Ind.: Cross Culture Publications, 1986), pp. 27-28, 36-40.
- 廿二・鐘鳴旦《楊廷筠》，頁261-268。
- 廿三・同上引，頁268。Paul A. Rule, 見註廿四與註廿七。
- 廿四・見 Paul A. Rule 轉引。Paul A. Rule, *K'ung-tzu or Confucius: the Jesuit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 (Sydney: Allen & Unwin, 1986), pp. 64, 257.
- 廿五・王鍾民《徐光啓集》，下冊，頁432。
- 廿六・Willar J. Peterson, "Why Did They Become Christians? Yang Ting-yuen, Li Chih-tso, and Hsue Kuang-chi," in Charles E. Ronan and Bonnie B. C. Oh, ed., *East Meets West: the Jesuits in China, 1582-1773* (Chicago: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47.
- 廿七・Rule, *K'ung-tzu or Confucius*, pp. 58-69.
- 廿八・參看 Louis Gottschalk, *Understanding History*, 2nd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9), pp. 221-262.